责编：沈辉 E-mail:zydxshenhui@2008.sina.com Tel:010—62806418

◆观 点

严防资本向政府公权力渗透

对于快速转型中的中国来说，如何防止政府官员利用国家公权力寻租，防止资本向政府公权力渗透，是非常迫切而艰巨的任务。资本和公权力的勾结有深刻的社会背景，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坚决而持久的努力。

在政治高于一切的计划经济年代，也有政府官员腐败，而且有的腐败也很严重。但在那个年代，全部生产资料都属国家和集体所有，民间资本基本不存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内的腐败是掌权者直接把手中的权力转化为衣食住行等物质享受。显然，这种以权力换取实物形态的消费能力有限，而且也很容易暴露。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急剧向市场转轨，资本与货币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权力主导微观经济的情况并未改变。各级地方政府从以政治挂帅的政治核心逐渐转化成“经济开发委员会”。权力与资本的合作越来越密切，权力寻租的现象开始大量出现，中国社会新的利益集团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对于资本和公权力的勾结，中国执政党高层并非没有意识到，舆论也并非没有进行批评。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一面被解决掉，一面又新产生，似乎很难断根。这有三个基本原因。

第一，用行政权力来管理社会和主导经济发展仍然是地方政府的习惯。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社会的大小事务基本上都处于行政权力的管理之下。而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建立起计划经济体系后，经济活动基本在行政权力的主导下进行。当社会进入向市场的转型时期，行政权力依然按照其惯性继续活跃在经济领域，这样一来，权力的寻租、权力的资本化就很难避免。

第二，相当一段时间，经济高速发展是各级政府的首要目标。经济高速增长离不开资本，资本很容易成为地方政府的追逐目标。许多地方政府都把招商引资当作压倒一切的任务。资本向公权力渗透在所难免。

第三，私有经济和资本在改革前一直受到压制，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民间的经济活力解放出来，政府大力扶持私营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的成长。然而，资本和权力一样，也会有不受制约扩张的冲动，除非有法律把它限制住。舆论往往单方面指责公权力寻租，而很少批评资本向公权力的渗透和收买，以及其对法律的突破。

由此看来，要想彻底解决资本与公权力勾结的社会弊端，最根本的就是要从制度上明晰地阻隔资本与公权力，坚决改革由行政权力主导一切的制度，逐渐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同时，对公权力和资本都要加强法律的监督。既要用法律来规范公权力的运用，也要用法律来规范资本的发展。只有做到把公权力和资本都关进法律的笼子，才能遏制资本与权力的合流。（2014 年 4 月 9 日《环球时报》寒竹）

清除利益固化之害

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利益格局，它反映不同社会主体在利益分配方面的处境和地位。但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其利益格局应能随经济的发展而做出相应调整。反之，一个社会失去调整利益格局的功能，也必然会失去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从表面看，固化的社会利益格局似乎是稳定的，但却隐藏着各种矛盾，积累破坏社会和谐的负能量。

中国共产党是旧时代一切不公正现象的批判者。在革命战争时期，无论斗争多么艰难残酷，我党总能根据革命任务的需要，针对中国社会生产关系严重扭曲的现实，提出具体的主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其中就包含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理想，即彻底打破千百年来中国社会因循的怪圈，铲除一切产生和保护特权的制度，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但任何理想的社会都不可能一次性建成。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利益格局的固化，无疑就是一种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不公平。既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完美的天堂，真正的共产党人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作为执政党，在此类顽瘴痼疾面前究竟有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无疑是一场严肃而巨大的政治考验。

从更广的角度看，通过改革打破社会利益固化的藩篱，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是纠正不良政风和世风的需要。由于利益固化的藩篱首先保护特权，而受到保护的特权必然会失去对社会的责任。一个有特权思想的领导干部，其执政的心态和作风必然是对权力和职位负责，骨子里是对自己的利益负责，而不是对人民和社会负责，于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便会大行其道。同时，由于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不完善，政府的职能还没有完全转变，行政权力对许多社会资源有直接掌控的功能，权力寻租的概率非常之高。寻租的权力肯定会表现出各种腐败的形式，包括冒犯罪的风险接受各种贿赂，以及赤裸裸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由此而论，干部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实际上就是社会利益格局日渐固化情况下出现的不良政风。

其实，从古到今，不管社会制度的差别，也无论发展水平的高低，利益总是最能牵动人心。在古代，面对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利益固化，一些杰出的政治家都曾想有所作为。比如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等人就曾借助皇帝的支持启动过有影响力的改革，但结果都是人亡政息，其原因都在于传统政治的保守性和自然经济的封闭性。近观之，苏联的解体也与其社会利益格局的固化和不能自觉调整有关。

面对中国社会发展要求和面临中国发展的每一次历史考验，中国共产党总是在困难和障碍面前展示改革的勇气和智慧。可以肯定，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破除各个领域内利益固化的藩篱，给更多的社会主体以均等的发展机会，这必将给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注入长远而持久的活力。（2014 年 4 月 9 日《光明日报》王鸿生）

被遗忘与被坚持的国家任务

一项重要学术研究项目，需要得到国家的支持，但是真正要取得成果，更在于研究者自身的学术兴趣与坚持投入。这给我国科研管理体制的启示是：国家对科学研究要给予大力支持，同时要减少对科学研究的行政主导，要把学术的事情交给学者和学术共同体来完成。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车洪才编纂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将于今年出版。这是一项几乎被人遗忘的国家任务。某一项国家任务被遗忘，首先缘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如领导变动、领受任务的学者的工作变动等，但也反映出政府（或者政府委托的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主导学术项目的共同问题——对科研项目的确定，对研究过程的推动，很大程度上都维系在政府身上，一旦机构人员变化，科研项目就存在变数。车洪才教授承担的国家任务在推进中遇到的问题，和今天一些政府课题几乎一样，都是重立项轻研究，在科研项目立项之后，当事各方就大功告成，至于项目的研究进展、成果如何，往往并不受关注。更严重的问题是，如学术界流行的说法“（申请项目时）说过了就是做过了，做过了就是做好了”，不少国家任务在下达时十分隆重，很快有关政府部门或机构就把具体的任务淡忘了，剩下的就是如何“消化”经费、如何摆平方方面面利益的事了。

在行政主导的科研体制中，学者们更看重科研项目的性质、经费的多少，而较少关注自己的学术兴趣和项目本身的学术价值。据出版社介绍，像辞书编写这样的冷门工作，现在一般不会纳入国家科研项目，多数年轻学者并不愿意涉及，更不愿意为此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更进一步说，像车洪才教授这样专注于自己的学术兴趣、潜心投入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的学者，在当下其实是很难“生存”的。

这样的学术研究环境亟须改变。行政主导的学术研究不但受制于行政意图，难以让学术自治，也会催生急功近利、浮躁冒进的学风，学者会失去自己的学术追求，转而围着功利的学术指标转。这样的学术指标，会把学者的研究集中在行政主导的领域，政府不重视的领域就乏人研究，由此产生很多“应景研究”“政绩工程”或“烂尾工程”；也会让学者失去学术研究的兴趣，甚至失却基本的学术操守，并把学术共同体异化为利益共同体。

坚持 30 多年，只为完成一部政府部门不再关注的辞书，为了救赎一项已被遗忘的国家任务，在今天的学术界，还能找到多少像车洪才教授这样的学者？培育、发扬这种可贵的学术精神，珍视、巩固这种不竭的科研驱动力，需要改变行政主导的学术体系，需要学术共同体坚守学术价值，让学者摆脱行政主导的学术指标的干扰，真正回归学术理想和学术兴趣。（2014 年 4 月 9 日《北京青年报》岳评）

◆史海钩沉

“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方法的来龙去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讲到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时均强调，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也明确指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那么，“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究竟是如何提出来的？它的来龙去脉又是怎样的呢？

“摸着石头过河”本来是一句民间俗语，指的是在没有前人经验、没有现成的桥和船的情况下，要想过河就必须以身试水、摸索前进，民间歇后语“摸着石头过河——稳稳当当”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把“摸着石头过河”这句民间俗语引入社会工作方法领域，其含义就是指在实践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必须大胆试验、积极探索、摸清规律、稳步前进。所谓“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中的“摸着石头过河”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究竟是谁将“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作为一种工作方法提出来的呢？从现在能够查阅到的资料来看，最早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方法的是作为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陈云。陈云最早提出“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是在 1950 年 4 月 7 日，他在政务院第 27 次政务会议的发言中指出：“物价涨不好，跌亦对生产不好。要‘摸着石头过河’，稳当点为好。”这是笔者所见到的陈云最早从工作方法角度阐述“摸着石头过河”的论述。

一年多之后的 1951 年 7 月 20 日，陈云在《做好工商联工作》一文中再次强调指出：“办法也应该稳妥，这叫摸着石头过河。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点。”1961 年 3 月 4 日，陈云在听取化工部关于化学肥料工业的汇报时强调指出：“一方面试验研究要敢想敢说敢做；另一方面，具体做必须从实际出发，要摸着石头过河，要把试验研究同推广分别开来，推广必须是成熟的东西。”

改革开放以后，陈云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先后多次从改革方法论的角度讲到要“摸着石头过河”，比如 1980 年 12 月 16 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重要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论述了改革开放应采取的原则和方法，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在 12 月 25 日的闭幕会上，邓小平明确表示完全同意陈云的讲话，他说，陈云的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 31 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

1984 年 6 月 30 日，陈云在中联部反映美国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对我国财经工作提出两条意见的内部材料上批示：“有经验的外国人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所有外国资本家都是如此。凡属危险项目，他们不搞，宁吃利息。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道理。”在这里，陈云再一次强调了在改革开放中坚持“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工作方法的重要性。

1988 年 5 月 12 日，陈云在杭州同浙江省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做工作，不能只想快。慢一点，稳一点，少走弯路，走弯路的损失比慢一点的损失多。有人批评说‘摸着石头过河’不对，但没有讲出道理来。‘九溪十八涧’，总要摸着石头过，总要下河去试一试。‘摸着石头过河’，这话没有错。”这是我们见到的陈云最后一次谈对“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这大概也是他唯一一次对那些误解甚至批评“摸着石头过河”方法的人的反批评。

从陈云关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一系列论述来看，这一思想并非像有的人认为的那样，是不要理论指导的所谓“胡乱摸索”，而是在高度重视理论研究和顶层设计前提下的大胆探索、大胆试验、尊重规律、稳步前进的科学方法。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对“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方法是完全赞同的。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既不可能在马列主义本本上找到现成答案，也没有任何现成的实践经验可以照搬照抄，所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他还指出：“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由此看来，邓小平的思路和陈云是完全一致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把“摸着石头过河”也视为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思想，看作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思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的辩证关系，在改革实践中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其目的就是进一步要求人们不仅要注重加强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而且还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通过不断摸索规律，在实践中获得真知，更加积极稳妥地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前进。（2014 年 4 月 9 日《中国社会科学网》韩振峰）

◆评 论

把更多的高尚化为寻常

“壹微尘”是谁？“壹微尘”在哪里？日前，在山东聊城兴起的寻找“壹微尘”热潮，让更多人知道了这个名字背后不平凡的故事。

这则故事与宁波的“顺其自然”、青岛的“微尘”不同之处，是一个聊城人把好事做到全国各地。相同的是主人公都希望把做善事当作寻常之举，不愿在“全城寻找”中亮相。

宁波的“顺其自然”到底是谁？其实放在宁波市慈善、邮政、媒体面前有很多唾手可得的线索，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放弃寻找，尊重这位好心人不愿意露面的意愿。聊城的“壹微尘”无法不与他帮助的人见面，但至今未暴露自己的身份，当地政府如果真想验明其身份也不难，但他们表现了“不作为”的智慧。

聊城人说得好：“其实我们没有必要知道‘壹微尘’是谁，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壹微尘’的奉献精神。”事实上，隐形的先进人物比一些显形的先进人物，其社会影响力和人心感染力更大。“你从不寻求名声和崇拜，可是爱之神却发现了你。”在“壹微尘”的感召下，他所属公司很多员工也加入到爱心队伍中来，聊城“壹微尘”爱心传递志愿者组织随即成立。宁波通过“顺其自然”的感召，据今年年初统计，到市慈善机构隐名捐款的爱心人士累计已有 3000 多人次，捐款总额 3500 多万元。同时，“顺其自然”们向往寻常生活的权利也得到了尊重。

不必讳言，有些善人善行一旦被官方高调宣传，虽然放大了正能量，也给当事人形成了不必要的压力，有的地方不得已提出保护措施，公众对有些不堪重负者也寄予深深同情。

避开聚光灯，选择了低调和沉默，对于追名逐利的浮躁社会来说，是有别于爱心的另一种稀缺资源，官方和公众不能以一般的扬善尚美方式应对。急于把美和善引以为自豪，或当作一方政绩的心理，急于按主观想象对爱心善举进行诠释，与“壹微尘”们的精神境界也许相距甚远。

聊城的“壹微尘”等爱心义举是“行不言之教”，官方和社会放弃寻找是“处无为之事”。而“不言之教”和“无为之事”正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推崇的核心理念，是社会道德建设的科学方法，照这样做下去，把更多的高尚化为寻常，才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希望。（2014 年 4 月 10 日《长江日报》易国祥）

◆纵 横

气候成就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蒙古帝国的创立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成吉思汗。1206 年，他成功地统一了蒙古各部，成为大汗，直至 1227 年西征西夏时去世。

但令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许多人一直困惑的是，一个来自漠北干旱、寒冷草原的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怎么就能够所向无敌地横扫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一项最新的权威科学研究成果显示，成吉思汗的霸业要得益于当时的气候变化。

此前有许多学者都想当然地认为，是因为原居地恶劣的天气迫使成吉思汗不得不率部族南迁，以便解决面临的严峻的生存危机。但一项最新的权威科学研究成果却表明事实恰恰相反——当时的气候条件并不恶劣，反而发生了有益的气候变化。正是这种气候变化在蒙古帝国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尼尔·佩德森和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专家艾米·E·赫斯尔教授等 5 位科学家共同开展了这项研究，论文《多雨、干旱、蒙古帝国和现代蒙古》日前在线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

佩德森和赫斯尔 2010 年在蒙古中西部杭爱山脉研究“天气、火、山林历史”时，发现了一批非常罕见的古老树种。这些多结节、矮小但却非常苍劲的西伯利亚松树，无比顽强地生长在干旱、贫瘠的火山熔岩缝隙之中。他们随后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存活了 1100 多年，甚至有棵木头上的年轮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 650 年，表明这棵树已经活了 2700 多年。以佩德森和赫斯尔为首的研究团队将这些样本与更年轻时倒下的树木和一些从活树上取下的样本进行了比较，获得了包括成吉思汗崛起时期在内的重要历史气候信息。

他们借此重建了从 900 年到 2011 年这 1112 年的降水记录，结果表明：蒙古帝国建立前的 1180 年至 1190 年，漠北草原确实曾经历大旱；但在蒙古帝国扩张初期的 1211 年至 1225 年，漠北草原却经历了此前和此后均没有过的持续降雨和温和的气候。如此不寻常的好气候，让蒙古大军得以粮草充足，从而用精良的骑兵四处征战，在欧亚大陆扩大了自己强大帝国的版图。

科学家们在论文中写道，一些观点认为可能是恶劣的气候条件迫使蒙古帝国向外扩张，但研究发现的事实却恰恰相反。他们的研究发现：13 世纪初，通常寒冷而干燥的漠北草原迎来了该地区过去 1000 多年中最温和、最湿润的气候。这种气候刺激了草原的旺盛生产力——牧草资源丰富起来，战马和其他牲畜数量激增。这些都为一个建立在马和其他牲畜基础上的、以彪悍骑兵为主的帝国的扩张提供了历史性的充足资源。

换句话说，800 多年前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在漠北草原崛起，是因为幸运地遇到了温暖而湿润的好天气才能成功的。

或许会有人尤其是成吉思汗的铁杆粉丝们仍然坚持认为，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够成就蒙古帝国的雄伟霸业，与其卓越的军事谋略智慧和蒙古铁蹄的所向披靡有很大的关系。但如果冷静地仔细想想，假若天公不作美，出现了恶劣的气候，比如肆虐的严重干旱和旷日持久的暴风雪，那将使成吉思汗所率领的铁骑变得失去战斗力——如果麾下只有几匹瘦弱的战马，成吉思汗的军事谋略和铁蹄骑兵恐怕就无法发挥什么作用了，至少一定会大打折扣。

赫斯尔认为，从极度干旱变成极度湿润，表明气候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她指出，“气候不是唯一发挥作用的因素，但它为一个有魄力的领袖从混乱中脱颖而出、发展军队、集中权力创造了理想条件”，这段不寻常的高湿度时期“创造了不寻常的草原生产力，这导致马匹数量增多。成吉思汗充分利用了这个重大机遇”。

毫无疑问，那个长达 15 年的温暖湿润气候产生了比往常丰盛得多的战略资源——牧草，而牧草的增长有力地推动了马匹数量的增长，马匹数量的增长则进而壮大了蒙古帝国的作战军备。显然，对于一支骑在马背上的军队来说，丰盛的牧草就意味着强大的作战能力。

美国阿肯色大学的古生物气象学家大卫·斯塔勒说：“这一研究非常强烈地让我们再次争论蒙古帝国崛起与扩张的原因，并将激起许多历史学和考古学的新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往往认为，气候变化能够改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人类的历史，比如中美洲玛雅文明的消失、罗马帝国的扩张与衰落、东南亚吴哥王朝的崩溃等，归咎于干旱、洪水和其他灾难性的天气，但却很少有人将一个帝国的兴起与有益的气候条件联系到一起。像佩德森和赫斯尔这么做，除了能够改写我们对历史事实的客观认识，同时还将引出一系列耐人寻味的问题，比如对于资源供给的研究分析将大大丰富历史的深度和广度。（2014 年 4 月 10 日《共产党网》轩逸）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邮政编码：100091 社长兼总编辑：谢春涛 常务副总编辑：钟国兴 广告部电话：62805980 62806380 发行部电话：62806227 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62805368 62806234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 180 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 0301 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